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婚姻匹配模式的变迁*

齐亚强　牛建林

提要：文章利用 2006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了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我国婚配模式的变迁，检验了工业化理论对我国婚配模式演变的解释效力。研究发现，我国各时期的婚姻匹配模式主要表现为不同社会特征群体的同类婚；此外，各时期的异质性婚配现象呈现明显的对称性。不同社会特征婚姻匹配强度的变化趋势部分印证了工业化理论，自致性特征在婚姻匹配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而先赋性因素的重要性则经历了一个先降后升的过程。对同类婚和异质婚具体形式的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社会阶层的边界可渗透性在各时期存在明显差异，相应的同类婚和异质婚现象也呈现不同的特点。

关键词：婚姻匹配　同类婚　异质婚　工业化　现代化

一、引　言

婚姻是个人行为和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一个社会的婚姻匹配特征不仅关系着个人与家庭的生活质量，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资源和财富的集聚程度、社会分层体系的运转、以及社会再生产的诸多方面。在一定意义上，婚姻匹配程度可以反映社会组织结构的开放性（Smits, Ultee & Lammers, 1998）。因而，了解婚姻匹配模式及其变迁，已成为社会科学研究者理解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的重要窗口。

世界多数国家的发展历程表明，在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现代化，婚姻匹配模式必然发生质的变化（Xu, Ji & Tung, 2000; Zijdeman & Maas, 2010 等）。传统社会中，婚姻匹配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夫妇双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对等，也就是所谓的“门当户对”。现代社会中，随着大众教育、城市化、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等元素的发展，家庭社会背景对子女婚姻选择的决定性作用开始削弱，婚配主体的自主性显著提升（徐安琪，2000；孙秀艳，2002；张翼，2003 等）。工业化理论（Kerr et al., 1960; Blau & Duncan, 1967; Treiman, 1970 等）为理解这一演变过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该理论指出，在工业化过程中，劳动力市场和社会生活都经历了重要的变革。随着大量新兴职业和工作机会的涌现，原有的职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以扩展家庭为主要单位的生产模式被打破，家庭背景在个人地位获得中的影响力下降。在劳动力市场上，个人的自致性特征（如教育等人力资本）成为反映其成功潜力的重要标志（张翼，2010）。这一变化反映在婚配选择中，个人的经济潜力开始成为婚配双方考虑的重要标准，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为代表的先赋性特征的重要性不断下降（Kalmijn, 1998）。与工业化过程相一致，现代化进程，包括初等教育的普及、大众传媒的发展、城镇化与人口流动、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的革新等，进一步强化了婚姻选择中自致性特征的重要地位（Zijdeman & Maas，2010）。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先后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现有研究从不同侧面记录和探讨了过去几十年来我国婚姻匹配模式的变化，然而，到目前为止，较少有研究系统地检验工业化理论在解释我国婚姻文化变迁中的适用性，关于工业化进程中婚姻匹配选择的具体变化轨迹的研究则更为少见。纵观过去半个世纪中国社会文化的重大变迁，基于西方国家经验的工业化理论是否能够有效解释我国特有文化和历史进程下婚姻匹配模式的演变？我国婚姻匹配模式及其具体变化轨迹又是如何？这些仍然是目前我国婚姻匹配研究中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深入考察这些问题对于我们认识社会分层体系以及社会再生产的本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利用 2006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通过拟合对数线性模型及其扩展模型，试图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初婚同期群的婚姻匹配模式，考察我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是否伴随着婚姻匹配中家庭先赋性特征重要性的下降和个人自致性特征重要性的上升，以此来检验工业化理论对解释我国婚姻匹配模式演变的适用性。具体而言，本研究关注的内容主要包括：1）通过分析我国婚姻匹配模式的演变过程，系统检验工业化理论的适用性；2）从先赋性、自致性特征等多个维度分析我国婚姻匹配模式变迁的具体轨迹；3）深入剖析各时期不同维度的婚姻匹配现象中同类婚与异质婚的互动关系，探讨婚姻市场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边界可渗透性及其变化规律。

二、理论与文献综述

（一）工业化、现代化与婚姻匹配模式的变迁

婚姻匹配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它体现的是婚配双方在个人、家庭社会经济特征等方面的对应关系。大量社会科学研究表明，无论是采用种族、宗教、社会阶层、职业声望、教育程度或是其他指标来测度，绝大多数社会中婚配对象之间具有很强的相似性（Mare，1991；Kalmijn，1994；Xu et al.，2000；张翼，2003；李煜、陆新超，2008）。这种婚配特征的相似性通常有三种解释：1）结构理论：该理论认为婚姻市场通常由社会地位和地域位置来界定，在婚姻市场上具有相似社会地位或其他相似特征的男女相遇的机会更大，因而婚姻匹配关系主要表现为同类婚；2）文化理论：在择偶过程中个人倾向于寻找与自己价值、品味、趣向以及生活方式相同的对象，由此选择的结果为婚配主体的特征高度相似；3）理性选择理论：该理论认为潜在经济实力是婚配对象关注的重要因素，在婚姻市场上男女双方追求最大化婚配对象的经济潜力，其结果是经济潜力的相对位置相似的男女更可能结婚（Mare，1991；Kalmijn，1994；Xu et al.，2000 等）。

尽管婚姻匹配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中普遍存在，其具体表现形式却因社会结构、制度与文化差异等因素的影响而呈现重要差异。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无论从结构理论、文化理论还是理性选择的角度来看，一个社会的婚姻匹配模式都会发生本质的变化。例如，从结构理论出发，前工业化社会中，社会地位划分的主要标志是家庭背景等先赋性特征，婚姻匹配主要表现为两个家庭之间的“门当户对”；在工业化进程中，个人教育程度和职业等自致性因素逐步取代先赋性特征成为其社会地位的主要标志，这样婚姻匹配中的社会距离逐渐由先赋性特征的差异转变为自致性特征之间的差异。与此同时，随着现代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地理距离对婚姻市场的限定作用逐渐减弱，不同社会群体的地域流动和社会流动都呈现上升趋势，家庭对其成员行为的实际约束力下降（张翼，2003；李路路、王宇，2009），这无疑进一步弱化了家庭在婚姻匹配过程中的影响。

从文化角度来看，前工业化社会中，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文化壁垒相对分明，婚配过程中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家庭在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距难以跨越，而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往往伴随着初等教育的普及和大众文化的兴起。一方面，教育普及过程，尤其是大众传媒所带来的空前的文化信息交流，有助于缩小不同社会阶层之间

的文化差异、削弱文化的代际传递关系，从而有可能改变原有的以家庭背景划分的社会阶层内婚现象；另一方面，教育普及并非彻底消除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文化差异，而是将这种差异集中反映在高等教育阶段（如 Mare，1981）。这样，高等教育与较低教育程度之间的社会边界往往更为突出。由于教育分层体系和结构的变化，高等教育群体内部的同类婚现象有可能会提升。

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看，前工业化社会中，家庭是组织生产和消费的基本单位，个人的经济潜力、在婚姻市场上的吸引力主要受家庭社会经济特征的影响；在工业化社会中，经济生产活动的组织职能逐步从家庭中分离出来，个人的经济潜力更多地取决于本人的教育水平和职业成就。因而，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婚配选择对经济潜力的权衡也从家庭特征转向个体特征。

总之，不论从哪一种理论视角出发，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都将伴随着婚姻匹配模式的重要演变。这些演变突出地表现为，婚姻选择中先赋性特征匹配程度的下降和自致性因素匹配程度的上升。

（二） 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与婚姻匹配状况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转变，然而，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根据不同时期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的主要特征，我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经济恢复建设阶段（1950-1965 年）、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 年）、文化大革命后社会经济市场化初步发展阶段（1977-1991 年）、市场化与现代化深入发展的阶段（1992 年至今）[①]。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迅速确立了快速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建立并完善了以城乡分割为主要特征的户籍制度。随着全国土地改革和公有制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经济在经历长年战乱后逐步恢复，工业化水平取得了重要的进展。由于工业发展基础薄弱，总体来看，这一时期我国处于以农业为主的工业化发展初期。1966 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打断了我国快速工业化的进程，整个社会经济部门、社会结构限入失序状态，各项工业化指标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倒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并率先在经济领域实施改革。这些举措大大推动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1992 年以来，我国进一步确立了市场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经济体制改革迅速向其他社会领域渗透，工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现代化进程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伴随着社会经济

[①]这一划分与以往类似研究基本保持一致，可参见：张翼，2003；Xu et al.，2000。

的现代化，人口流动规模与城市化水平迅速提升，新中国成立初期确立的户籍制度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城乡二元体系的社会结构开始松动。

针对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转变的特点，不少学者从择偶标准、婚配特征等角度探讨了我国不同社会群体的婚姻匹配关系及其变迁。概括而言，这些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类，第一类研究从婚龄男女择偶标准的历史演变分析我国婚配文化的变迁。这些研究指出，与社会变迁相适应，中国人的婚姻观、择偶观随时代发生了重要变化（吴雪莹、陈如，1997；徐安琪，2000；孙秀艳，2002 等）。具体来说，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前，政治因素对婚姻选择具有决定性影响，个人的家庭成分、政治面貌、社会关系等条件在择偶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一现象在“文革”期间发展到了极致。改革开放以来，市场机制运作中利益获取和财富积累不再主要依赖家庭成分等先赋性条件，而更多地与学历、职业、能力、胆识等个人素质相联系。与之相对应，择偶过程越来越多地注重个人的情感、品质和能力。

第二类研究利用已婚夫妇双方个人及家庭特征信息，分析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及其变化趋势。代表性的研究包括，张翼（2003）利用 2001 年“社会结构变迁调查”的抽样数据分析“已婚有偶”夫妇受教育程度、职业、父亲职业、父亲受教育程度等特征的相关关系及其变化特征、以及李煜等（2008）利用 2006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初婚夫妇个人自致性特征与家庭背景的相关性。这些研究指出，“阶层内婚制”，即婚配发生在同一阶级或阶层内部的现象，在中国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中同样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模式随时间呈上升趋势，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后。

第三类研究在控制男女不同特征的结构性差异的基础上，分析婚姻匹配模式的变化趋势。这类研究主要使用对数线性模型对男女个人及家庭特征的边际分布进行控制，从而分析婚姻匹配现象的具体特征，包括同类婚、向上婚、婚姻梯度等。例如，许小禾等（音译）利用成都和保定两市调查数据，考察了中国城镇地区已婚夫妇的婚配模式特征及其变迁规律（Xu et al.，2000）。该研究指出，被调查城镇地区的婚姻匹配中，以教育、职业、政治面貌、单位性质、社会阶层等为标志的同类婚在各时期均占绝大多数；异质婚中，向上婚与向下婚对称共存，女性向上婚现象并不明显。李煜（2008）利用 2000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可匹配的夫妇信息，考察了我国 1949-2000 年初婚同期群夫妇的教育匹配特征。研究发现，我国婚姻中教育匹配的同质性特征呈不断增强趋势；改革开放以后，受市场不确定性的影响，同类婚在婚配模式中占据更为突出的地位。类似地，韩红云（Han，2010）

利用 2000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 2001 年人口与生殖健康抽样调查数据，考察了 1970-2001 年我国初婚同期群的教育匹配模式。该研究表明，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已婚夫妇双方的教育同质性明显上升，尤其是在较高受教育程度的男女之间。受城乡二元社会经济体系的影响，婚姻的教育匹配模式在城乡之间存在重要差异。李煜（2011）利用 2006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考察了父亲职业与本人受教育程度的“双匹配”关系强度及其变迁。该研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婚姻的教育匹配程度大幅上升，而父亲职业的匹配关系则呈现小幅波动。“双匹配”关系强度的分析，为理解家庭背景和个人特征在婚姻匹配中的相互关系提供了有益尝试。然而，由于“双匹配”对应的匹配表维度大幅上升，抽样调查数据往往不能满足研究方法对样本量（单元格频数）的要求，这也就必然影响相应研究结果的有效性和稳定性。

现有研究从不同角度展现了我国婚姻匹配观念、婚配现象的演变特征，为理解婚姻匹配模式及其变化规律提供了重要的实证依据。然而，由于各研究的立足点、研究问题不同，上述第一类研究主要考察婚姻选择观念与理想，因而并不直接反映现实的婚姻匹配关系；第二类研究关注的是已婚夫妇各种特征的相关性，由于未控制男女在个人及家庭特征方面的结构性差异，因而其研究发现难以将婚姻匹配模式从特定时期人口与家庭特征分布的结构性影响中分解出来。第三类研究分析了婚姻匹配的具体模式，如同类婚、向上婚等特征，不过，目前这类研究在我国为数较少，且主要集中于对教育匹配关系的考察（除 Xu et al.，2000 外）。此外，尽管这类研究分解了不同时期各主要婚姻匹配模式（同类婚、向上婚等）的相对重要性，然而，对于这些婚姻匹配模式的具体构成，如教育同类婚现象主要表现为哪些教育程度的同类婚，跨层难度在哪些教育梯度之间比较突出等等，这类问题现有研究还涉猎较少。最后，不少国家和地区婚姻匹配现象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工业化理论，然而我国现有相关研究很少直接检验工业化理论的适用性。考虑到我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快速而曲折的工业化历程以及与之相伴的社会经济市场化的剧烈转型，分析我国婚姻匹配模式的演变对于检验工业化理论的适用性具有特殊的意义。综上所述，为深入了解我国婚姻匹配模式的演变特征，尤其是快速的社会变迁、现代化进程对婚配行为的影响，有必要对我国婚配模式的内在特征进行系统分析。

三、研究问题与假设

本文主要探讨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婚姻匹配关系所表现的具体模式及其演变过程，以此来检验工业化理论对解释中国婚配模式演变的适用性。本文的研究问题是，我国的工业化转变过程是否伴随着家庭先赋性特征在婚姻匹配中重要性的下降和个人自致性特征重要性的上升。围绕这一研究问题，文章首先考察各时期我国婚姻匹配的具体模式，在剔除个人和家庭相应特征的结构性差异和变动的影响后，分析我国婚配选择中同类婚和异质婚的特点。其次，文章分析在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先赋性特征和自致性特征在婚姻匹配选择中的相对重要性及其演变趋势。最后，文章针对不同社会特征的婚姻匹配现象，具体考察各社会群体同类婚与异质婚发生可能性的相对变动关系，从而探讨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对具体婚配模式的影响。

在本研究中，先赋性特征主要由父亲职业来表示，自致性因素则由本人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来测度。除以上维度外，我们还考虑不同户口类型之间的婚姻匹配情况[①]。具体而言，本文主要包括如下假设。

假设 1：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婚姻匹配的模式以同类婚为主要特征。从有关婚姻匹配的理论来看，同类婚现象既是人类理性选择行为的结果，同时也是社会结构差异和文化壁垒对婚姻匹配过程影响的集中体现。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尽管婚配选择中所关注的特征各异，但是同类婚现象有望在各时期普遍存在。

假设 2：新中国成立以来，先赋性特征在婚姻匹配中的重要性下降，自致性因素的重要性不断上升。这与工业化理论对婚姻匹配关系变动趋势的直接预测相一致。考虑到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的特殊性和曲折经历，这些因素在特定历史时期（如“文革”期间）可能因政治体系变革而呈现波动。不过受工业化、现代化转变总体趋势的影响，这些潜在的变化趋势有望保持相对稳健。具体来说，假设 2 可以分为如下两个假设。

2a：父亲职业在子女婚姻匹配中的重要程度呈总体下降趋势；

2b：个人受教育程度、职业在婚姻匹配中的重要性呈上升趋势。

[①]户口状况一直是影响我国社会分层、结构分割的重要制度因素，对于认识我国的婚姻匹配关系具有特殊意义。婚配主体的户口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受先赋性特征的影响（如继承父母的户口类型），同时也可能因为自致性因素而改变（如农业户口者通过升学、招工、参军等获得非农业户口）。因而，在婚姻选择过程中户口的重要性综合反映了先赋性和自致性特征的共同影响，其变化趋势也应介于先赋性特征与自致性特征之间。

假设 3：户口类型在婚姻匹配选择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在户籍制度出现松动以前。这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与户籍制度相联系的城乡分割、行政区域分层的现实，以及这些分层体系对婚姻市场界定和个人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发展、户籍制度的松动以及人口流动规模的上升，户口类型对社会结构的分割作用有所削弱，其在婚姻选择中的重要性有望下降。

四、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数据与变量

本文主要使用 2006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数据。该数据是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香港科技大学调查研究中心合作完成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中 2006 年度调查数据。该调查采用分层多阶段概率抽样设计，调查范围覆盖了大陆地区除青海、西藏、宁夏外的 2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调查对象为年龄在 18-69 岁之间的中国居民。CGSS2006 收集了非常丰富的婚姻匹配信息，包括被访者在初婚时本人及其配偶的教育、职业、户口类型以及双方家庭社会经济特征等方面的回顾性信息，为本文研究我国初婚夫妇婚姻匹配关系提供了宝贵的数据资料。

在 CGSS2006 数据中，有初婚经历的被访者共 8758 名（即为本文的分析样本）。这些被访者的初婚时间分布在 1950 年到 2006 年之间，涵盖了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经济从恢复建设到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快速发展的整个过程。因此，考察这些被访者初婚时的婚姻匹配关系，为全面理解我国婚配模式在工业化与现代化过程中的变迁历程提供了重要的机会。

本文主要关注工业化不同阶段我国婚姻匹配的具体模式，研究的因变量是初婚夫妇具体特征的交叉分布，包括夫妇双方父亲职业、本人户口类型、本人教育程度以及职业的匹配关系。其中，初婚时夫妇双方父亲的职业为先赋性特征，各时期父亲职业的匹配程度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先赋性特征在婚姻匹配中的地位及其变化趋势[①]。相应地，自致性特征的测度指标为个人受教育程度和初婚时的职业。考虑到我国社会经济体系中城乡二元格局以及独特的户籍管理制度，本文同样考察初婚时夫妇双方户口类型的匹配关系。

[①] CGSS2006 也收集了被访者初婚时夫妇双方母亲职业的信息，但由于母亲职业信息缺失较多，回答“其他”的比例也较高，因而本文仅使用父亲职业。

本文对父亲职业和本人职业的划分均采用常用的职业大类，以避免由于不同时期社会分层体系变化而导致的职业转换指标（如计算社会经济指数 SEI）的不可比性和复杂性。具体而言，本文使用的职业分类包括机关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服务人员、工业劳动者、农业劳动者以及其他[①]。考虑到各时期不同类型户口所对应的社会资源不同，本文将户口类型依次划分为农业户口、县镇级非农业户口、地级市非农业户口以及省城及以上非农业户口。类似地，在教育程度的划分中，结合各时期不同学历人口的相对规模以及这些学历对应的经济潜力、文化资源、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异，依次划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

分析样本中，初婚时夫妇双方父亲职业相同的约占 68.8%，夫妇双方户口类型相同的约占 90.5%，夫妇双方受教育程度相当、职业相同的分别占 53.7%和 54.7%。这些数据反映了我国不同社会特征的婚姻匹配中明显的同类婚倾向。

（二）方法

由于各时期具有不同社会经济特征的男女边际分布存在较大差异[②]，为了展现婚姻选择的内在特征及其变化趋势，有必要对上述结构性差异加以控制。因此，本文采用对数线性模型及其扩展模型来分析婚配方形表数据（Clogg & Shihadeh 1994；Goodman 1979）。

为了考察我国婚配模式随工业化、现代化过程所发生的变化，文章将分析样本划分为不同的初婚同期群，并以此为背景变量，拟合层效应模型（layer effect model，参见 Xie 1992; Goodman & Hout 1998）。具体而言，本文将考察样本划分为四个初婚同期群，即初婚时间为 1950-65、1966-76、1977-91 和 1992-2006 年，分别对应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社会经济恢复建设时期、文化大革命期间工业化发展经历曲折时期、文化大革命后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市场化起步阶段、以及 1992 年以来市场化深入发展的阶段。

本文的分析策略为：1）以条件独立模型为基准模型，在此基础上建立条件准独立模型、条件准对称模型、行列效应模型、跨层效应模型等一系列嵌套模型，通过对比各嵌套模型的拟合情况，检验同类婚、对称性异质婚等婚配模式的总体强度；2）以拟合最优的模型为基础，分析各时期具体婚配模式的强度及其变化趋势，检验工业化理论的适用性；3）针对各婚配特征的社会梯度分析其边界跨越难易程

[①] 由于“其他”职业类型包含了众多不便分类的职业，其组内异质性较高且所占样本比例较低，因而本文在进行模型分析时将该类排除在外，仅考察其他六类职业的婚配情况。

[②] 限于篇幅，本文未展示相应分布表，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直接向作者索取。

度，剖析婚姻匹配关系中同类婚、异质婚的具体表现形式及其互动关系。具体而言，本文所使用的模型可以依次表示为：

1. 条件独立模型：

$$\log F_{ijt} = \mu + \mu_i^H + \mu_j^W + \mu_t^T + \mu_{it}^{HT} + \mu_{jt}^{WT}$$

其中，上标 H、W、T 分别表示行变量（丈夫的特征）、列变量（妻子的相应特征）以及背景变量（初婚时期），其取值分别对应下标 i、j、t。F_{ijt} 为 t 时期的初婚同期群夫妇所形成的婚配方形表分表中，丈夫的给定特征取值为 i、妻子的相应特征取值为 j 的期望频数。μ 为平均效应，即方形表中频数完全服从均匀分布时（即夫妇特征相互独立、婚配行为完全随机的假想情形）平均预期频数的自然对数。μ_i^H 、μ_j^W 分别为相应的行、列主效应；μ_t^T 、μ_{it}^{HT} 、μ_{jt}^{WT} 为背景变量的主效应及其与行变量、列变量的交互效应。条件独立模型假设，在控制初婚时期这一背景变量的情况下，模型所考察的特征（父亲职业、本人户口类型、教育程度、职业）在夫妇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

2. 条件准独立模型：

$$\log F_{ijk} = \mu + \mu_i^H + \mu_j^W + \mu_t^T + \mu_{it}^{HT} + \mu_{jt}^{WT} + D_{ijt}^{HWT} ,$$

$$D_{ijt}^{HWT} = 0 \text{，当} i \neq j \text{时}$$

其中，D_{ijt}^{HWT} 为对角线效应，即同类婚的强度。该模型假设，在控制背景变量的情况下，婚姻匹配模式主要表现为同类婚；在对角线以外，夫妇的特征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

3. 条件准对称模型：

$$\log F_{ijt} = \mu + \mu_i^H + \mu_j^W + \mu_t^T + \mu_{it}^{HT} + \mu_{jt}^{WT} + D_{ijt}^{HWT} + O_{ijt}^{HWT} ,$$

$$O_{ijt}^{HWT} = O_{jit}^{HWT} \text{，当} i \neq j \text{时；} \quad O_{ijt}^{HWT} = 0 \text{，当} i = j \text{时}$$

其中 O_{ijt}^{HWT} 为行列对称效应，即在控制边际分布的情况下，主对角线以外行变量等于 i 的男性与列变量等于 j 的女性婚配的发生比和相反情况的（即行变量等于 j 的男性与列变量等于 i 的女性）婚配发

生比相当。该模型在模型（2）的基础上进一步假设，在控制背景变量的情况下，异质婚呈现明显的对称性。

4. 行列效应模型：

$$\log F_{ijt} = \mu + \mu_i^H + \mu_j^W + \mu_t^T + \mu_{it}^{HT} + \mu_{jt}^{WT} + D_{ijt}^{HWT} + \psi_{ij}\phi_t$$

其中，ψ_{ij} 反映在控制边际分布的情况下夫妇特征的平均相关程度，ϕ_t 为 t 时期的初婚夫妇其给定特征的相关强度对平均相关强度的偏离度。该模型假设，各时期初婚同期群的异质性婚配模式相似，这种模式可以用平均相关系数来概括；但各时期异质婚的婚姻匹配强度因 ϕ_t 而异。为使模型有解，限定 $\sum \phi_t^2 = 1$，$\sum \psi_{ij} = 1$。

5. 跨层效应模型：

$$\log F_{ijt} = \mu + \mu_i^H + \mu_j^W + \mu_t^T + \mu_{it}^{HT} + \mu_{jt}^{WT} + D_{ijt}^{HWT} + C_{ijt}^{HWT}$$

$C_{ikt}^{HWT} = C_{ijt}^{HWT} + C_{jkt}^{HWT}$，当 $i < j < k$ 时；$C_{ijt}^{HWT} = 0$，当 $i = j$ 时

其中，C_{ijt}^{HWT} 为跨层难度参数，用以反映处于不同社会梯度的男女进行婚配的可能性（或难易程度），也即婚配对象克服相邻职业、户口类型、教育程度等特征之间障碍的可能性。该模型考察的是对于潜在的婚配对象而言，给定婚配特征的哪些梯度相对容易突破、形成外婚，哪些梯度刚性较大、具有明确的社会边界。

6. 考虑向上婚的跨层效应模型：

$$\log F_{ijt} = \mu + \mu_i^H + \mu_j^W + \mu_t^T + \mu_{it}^{HT} + \mu_{jt}^{WT} + D_{ijt}^{HWT} + C_{ijt}^{HWT} + Hyp_{ijt}$$

$$Hyp_{ijt} = -Hyp_{jit}\text{，当 } i \neq j \text{ 时。}$$

为检验我国婚配文化中女性向上婚现象在不同婚配维度的显著性，本模型在跨层效应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向上婚参数，由 Hyp_{ijt} 来表示。

五、主要研究发现

（一）我国婚姻匹配关系的主要模式与变迁

针对被访者初婚时夫妇双方父亲职业、本人户口类型、本人教育程度以及职业的匹配方形表，表 1 给出了相应的对数线性模型拟合结果。由模型拟合结果可见[①]，条件准对称模型和行列效应模型对父亲职业、本人户口类型及教育的婚配关系拟合最优，相应模型的拟合结果与观察频数分布无显著差异。从模型的简约性来考虑[②]，条件准独立模型对父亲职业和本人户口类型的匹配关系拟合优于其他模型，而行列效应模型对本人教育程度和职业的匹配关系拟合效果更好。

对比各嵌套模型的对数似然比卡方统计量（L^2），可以大体反映同类婚、异质婚等婚配现象的相对重要性（Xie，1992；Powers & Xie，2000 等）。与本文的假设 1 相一致，在控制边际分布的条件下，同类婚现象（即对角线效应）在本研究所考察的各匹配维度中均占主要地位。例如，夫妇双方父亲职业的匹配关系中，同类婚现象解释了 96.9%（=1-100.5/3225.6）；类似地，同类婚现象在夫妇户口类型的匹配关系中解释了 99.7%（=1-46.7/14291.8），在夫妇教育程度的匹配关系中解释了 77.7%（=1-867.7/3886.1），在夫妇职业匹配关系中解释了 95.5%（=1-241.4/5417.9）。总体而言，同类婚现象在各特征婚配关系中均占据绝对多数，这与以往的研究发现相一致。在异质性婚配现象中，夫妇特征仍高度相关（见行列效应模型拟合结果），且婚配关系呈现明显的对称性特征（见条件准对称模型）。尽管跨层效应模型的总体拟合结果并非最优，然而，这一模型对于理解异质性婚配关系中不同社会梯度或边界的可渗透性提供了有意义的信息（Mare，1991；Schwartz & Mare，2005），这一点将在下文中详细讨论。

表 1　关于不同社会特征的婚姻匹配情况的对数线性模型拟合结果

	L^2	自由度	差异指数	BIC
父亲职业匹配				
条件独立模型	3225.6	100	0.259	2331.0
条件准独立模型	100.5	76	0.021	-579.3

① 各模型的对数似然比卡方统计量与相应自由度，给出了各模型对数据拟合优度的检验结果以及嵌套模型之间的相对差异（Powers & Xie，2000 等）。

② BIC 考虑了模型简约性（parsimony）的要求，该指数取负值意味着相应模型比饱和模型更优，其负值的绝对数越大，模型越简约。

条件准对称模型	50.7*	40	0.014	-307.1
行列效应模型	73.6*	64	0.017	-498.9
跨层效应模型	81.4	56	0.019	-419.5
考虑向上婚的跨层效应模型	74.0	52	0.017	-391.1
户口类型匹配				
条件独立模型	14291.8	36	.530	13965.0
条件准独立模型	46.7	20	.005	-134.8
条件准对称模型	17.1*	12	.003	-91.8
行列效应模型	13.9*	12	.002	-95.0
跨层效应模型	21.3	8	.003	-51.3
考虑向上婚的跨层效应模型	14.4	4	.002	-21.9
教育程度匹配				
条件独立模型	3886.1	64	.259	3310.7
条件准独立模型	867.7	44	.080	472.0
条件准对称模型	11.8*	24	.005	-204.0
行列效应模型	22.9*	34	.010	-282.8
跨层效应难度模型	72.4	28	.018	-179.4
考虑向上婚的跨层效应模型	70.6	24	.017	-145.2
职业匹配				
条件独立模型	5417.9	100	.363	4524.8
条件准独立模型	241.4	76	.034	-437.4
条件准对称模型	59.2	40	.016	-298.0
行列效应模型	109.4	64	.024	-462.3
跨层效应模型	171.3	56	.029	-328.9
考虑向上婚的跨层效应模型	167.6	52	.029	-296.9

注：* p>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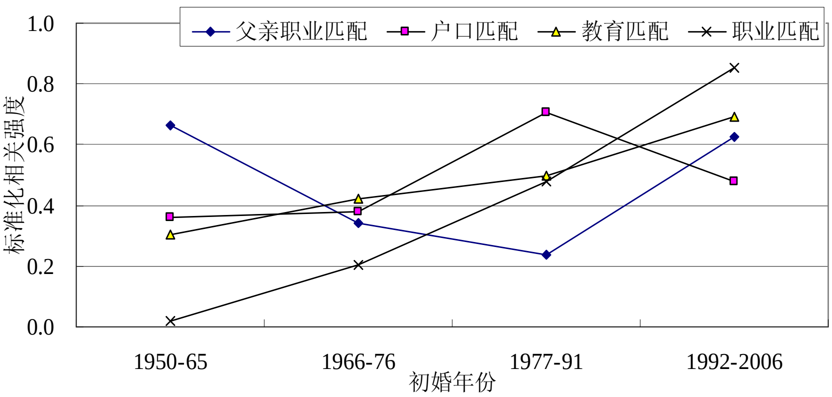


图 1　各时期不同社会特征在婚姻匹配中重要性的变化

为考察过去半个多世纪内我国婚姻匹配各维度的相对重要性及其变迁，检验工业化理论的适用性，本文以行列效应模型[①]为例，分析不同社会特征在婚配关系中相对重要性的变化。图 1 展示了不同时期的初婚同期群中，夫妇双方在父亲职业、本人户口类型、教育程度和职业方面匹配强度（即模型 4 中的参数 ϕ_t）的变化过程。由图 1 可见，在过去半个多世纪内，初婚夫妇双方父亲职业的相关强度总体上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父亲职业在婚姻匹配中的重要性不断下降，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这反映了随着工业化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家庭先赋性因素在子女婚配选择中重要性的下降。然而，与本文假设 2a 有所不同的是，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父亲职业在婚姻匹配中的重要性出现了一定的回升。这可能与这一时期市场化深入发展伴随的急剧社会转型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不确定性快速上升有关。与其他国家不同，我国的工业化过程同时伴随着社会经济体制从计划到市场的深刻变革以及由此带来的剧烈社会转型。在这一过程中，旧有的制度安排被打破，而新的制度体系尚有待完善，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不确定因素上升（Giddens，1991；Beck，1992；李煜，2008）。与中国传统家庭文化相联系，家庭背景在婚配选择中的重要性出现回升可能与社会转型的特殊影响有关。

与各时期父亲职业在婚配关系中重要性的变化不同，本人户口类型的匹配强度经历了相反的变化过程。在改革开放以前，初婚夫妇户口类型的相关程度相对稳定；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开始，随着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同户口类型所附着的社会经济差异开始凸显，户口类型在婚姻匹配中的重要性也得以提升。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不同户口类型所隐含的社会经济差异伴随着户籍改革的逐步推行开始缩小，户口类型在婚姻匹配中的重要性也出现下降，不过其水平仍高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与本文假设 3 基本吻合。

相比之下，初婚夫妇教育和职业的匹配强度在考察时期呈单调上升趋势，即便是在“文革”期间这一趋势也未发生逆转，这与本文的假设 2b 完全一致。个人自致性特征匹配强度随时间迅速提升，突出反映了工业化进程中婚配选择越来越重视婚配主体的经济潜力。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初婚夫妇婚姻匹配中各因素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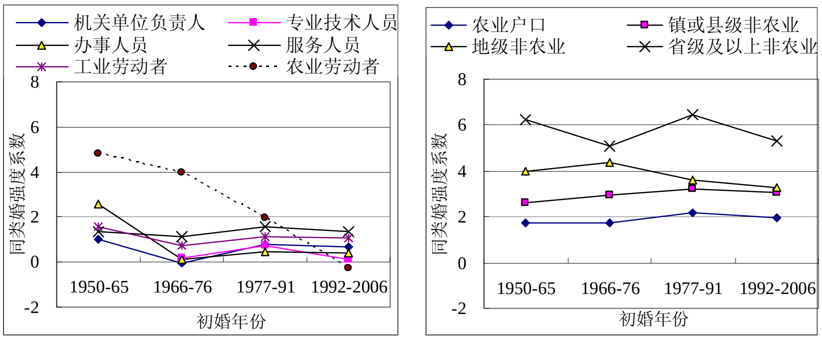
[①] 表 1 显示，对本文所考察的各特征的婚姻匹配关系而言，行列效应模型与条件准对称模型拟合优度较好，且无显著差异；但二者的简约性以行列效应模型更好。因而，本部分以行列效应模型为例进行分析。

性的变化基本上印证了工业化理论。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大众教育等现代元素的不断发展，以父亲职业为代表的家庭背景在子女婚配选择中的重要性不断下降，而以个人教育程度、职业为代表的自致性因素在婚配选择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随着改革开放与市场化的深入发展，剧烈的社会转型增加了社会行为与生活中的不确定性。与之相联系，这一阶段婚姻匹配关系中家庭背景等先赋性特征的重要性有所回升。因此，这一阶段我国婚姻匹配模式的变迁对工业化理论有所偏离。伴随着城市化与人口流动的空前活跃，这一时期户口类型在婚配选择中的重要性也出现明显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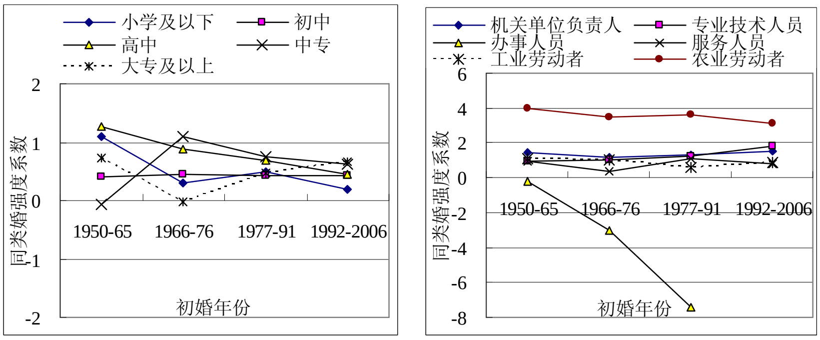
（二）不同社会特征同类婚现象的具体变化

以上本文讨论了我国婚姻匹配的主要模式以及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对各社会特征在婚姻匹配中重要性的影响：一方面，自致性因素在婚配选择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另一方面，先赋性特征的重要性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由下降转为上升。然而，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不同社会特征同类婚和异质婚现象发生了什么样的具体变化？特定时期同类婚现象占主体地位是否意味着所有社会边界的可渗透性都较低、不同社会梯度的初婚者都以内婚为主？为了解这些婚配现象的具体特征及其变化趋势，图 2 以行列效应模型为依据，分别展示了各时期父亲职业、本人户口类型、教育与职业匹配模式中，同类婚强度（即模型 4 中的参数 D_{ijt}^{HWT} ）的变化特征。

由图 2a 可见，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父亲职业匹配中同类婚现象突出地反映在农业劳动者的子女之间，其他职业从业者的子女发生同类婚的现象相对较少。“文革”期间，各职业从业者的子女选择同类婚的现象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反映了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政治与阶级划分对职业分层的影响。“文革”结束后，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职业在社会分层中的重要性重新回归，各非农职业从业者的子女选择同类婚的比例开始上升，而农业劳动者子女的同类婚现象却保持了稳定的下降趋势。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发展，各非农职业从业者的子女选择同类婚的比例相对稳定，农业劳动者子女的同类婚现象进一步下降。



(a) 父亲职业　　　　(b) 本人户口



(c) 本人教育程度　　　　(d) 本人职业

图 2　各时期不同特征婚姻匹配模式中同类婚强度的估计值

图 2b 所示为不同户口类型的匹配中同类婚发生强度的变化趋势。除省城及以上非农业户口外，各户口类型中同类婚的变化均较为平缓。各时期非农业户口的同类婚现象均高于农业户口者，且户口类型越高，同类婚现象也越为突出。“文革”期间，受工业发展停滞、城市就业机会缩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因素的影响，省城及以上非农业户口的同类婚现象出现明显下降；同一时期其他户口类型的同类婚现象变化较小，且略有上升趋势。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人口流动、城市化以及户籍改革政策的推行，不同户口类型在社会、经济资源等方面的差距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这样，不同户口类型的同类婚现象均出现下降。然而，与其他户口类型相比，这一阶段省城及以上非农户口的社会边界仍比较突出，这也与我国优先放开中小城市户口的户籍改革进程相一致。

图 2c 展示了教育匹配同类婚强度的具体变化。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同教育程度内部的同类婚现象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其中，

高中教育程度者的同类婚现象最强，而中专的同类婚可能性最低。这一现象可能与当时的教育体系及就业制度有关，中专学历与相邻学历者（如高中、高等教育）在文化、经济潜力等方面差距较小，因而更容易形成外婚。除中专以外，其他学历的同类婚强度在“文革”期间都经历了较为明显的下降，这与这一阶段教育以政治性、阶级性为纲的畸形发展有关，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在社会分层中的地位受到了严重的不利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与教育平等化的发展使不同学历者的同类婚现象呈趋同之势。值得一提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其他学历的同类婚强度在下降，高等教育内部同类婚的强度不断上升，这体现了随着初等教育的普及，教育不平等开始集中体现在高等教育阶段的社会现象。

与父亲职业匹配中同类婚强度的变化相比，本人职业匹配中同类婚强度随时间变化相对较小，尤其是机关单位负责人、服务人员以及工业劳动者的同类婚现象在不同时期均保持相对稳定（见图 2d）。相比之下，农业劳动者的同类婚强度随时间呈稳定的下降趋势，专业技术人员的同类婚强度则呈稳定上升趋势，这可能与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知识和技术在社会分工中的作用上升有关。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专业技术人员在专业技能方面比其他职业要求相对更高、选择性更强，因而这一职业的社会边界较为突出，同类婚可能性上升。与之相比，农业劳动者的社会边界弱化，且随人口流动有进一步下降之势，因此，农业劳动者的同类婚强度不断下降。与其他职业相比，办事人员的同类婚强度在各时期均最低，且随时间呈急速下降趋势[①]。这可能与办事人员这一职业的内部异质性较大、社会边界较弱有关。

（三）异质性婚配的具体特征及其变化趋势

同类婚是婚配现象的主要组成部分，然而受婚姻市场结构、婚配选择因素的多维性和复杂性的影响，异质性婚配现象在任何时期均客观存在。同类婚强度与异质婚强度的变化互为因果，因此，分析异质婚的特征及其变化趋势也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婚姻匹配模式的变化。异质性婚配既可能是对称性的，也可能是非对称性的，如女性向上婚。本文分别对两种模式进行了检验（见表 1 的模型检验结果），结果表明，对称性模式能够更有效地反映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异质性婚配关系的特征。尽管如此，考虑到我国传统的男高女低的婚配文化以及从夫居的家庭文化，分析研究对象中异质婚的具体表现形态，如女

[①] 图 2d 中，办事人员在 1992-2006 年所对应的同类婚强度系数估计值接近于 0，其对数接近于-∞，因而在图中未展示。

性向上婚的强度以及男女在不同社会梯度之间进行婚配选择的难易程度（跨层效应）仍具有现实意义（Mare，1991）。限于篇幅，本文接下来主要以教育程度与户口类型为例，展示各时期相邻教育程度或户口类型的男女之间发生婚配的可能性及其变化趋势。

1. *教育异质性婚配现象的特征与变化趋势*

图 3 分别就“男高女低”和“男低女高”的婚配模式展示了相邻教育程度之间跨层婚配的强度（即模型 6 中 $C_{ijt}^{HWT}+Hyp_{ijt}$ 的指数值）及其变化趋势。由图 3 左右两组曲线可见，教育异质性婚配中女性向上婚现象并不明显，“男高女低”与“男低女高”发生的可能性差异较小，在统计上并不显著（由模型（6）的检验结果可得）。

在考察时期的各阶段，教育的异质性婚配现象多数发生在教育梯度的顶端。除 1950-65 年间外，各时期大专及以上学历者与中专学历异性结婚的可能性均最高。这反映了过去半个多世纪里，我国较高教育程度者在就业、社会流动中的相对优势和排他性。在教育梯度顶端，各学历之间在资源、文化和经济潜力等方面差异较小，婚配现象更容易发生；相比之下，在教育梯度的底端，由于教育程度的差异往往不能直接、全面地反映相应资源、文化和经济潜力的差异，因而，相应学历异质性婚配的可能性往往更多地受其他婚配特征的影响。

与教育同类婚强度的变化特征相对应，不同时期异质婚现象反映了各教育梯度的相对开放性、可渗透性以及两两之间的相对距离。由图 3 可见，1950-65 年间，中专学历者与高中或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异性结婚的可能性明显高于其他教育程度之间的异质性婚配现象；而该时期中专学历的同类婚现象极少（见图 2c）。这表明，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受就业制度等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中专学历者与相邻学历者（如高中、大专及以上）在文化、经济潜力等方面差距相对较小、开放性较强，因而相应的异质性婚配现象更容易发生。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初，随着教育体系的变革，中专相对于高中在就业分配、社会流动等方面的优势开始凸显，二者的社会距离不断拉大；这一时期中专学历者与高中学历异性结婚的可能性下降，而其同类婚倾向、与大专及以上学历异性结婚的可能性则明显上升。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和就业分配制度的改革，中专学历与大专及以上学历在经济潜力、社会分层中的差距开始拉大；伴随这一过程，中专学历与大专及以上学历者结婚的可能性开始下降，而其与高中学历异性结婚的可能性又有所回升。

大众教育的发展使初中与较高教育程度（高中及以上）之间的可

渗透性不断下降，与较低教育程度之间的可渗透性有所增强。由图 3 可见，在教育梯度的底端，初中与高中学历者结婚的可能性随时间呈单调、快速的下降，其与小学及以下学历异性结婚的可能性则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初中与小学及以下学历者结婚的可能性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大致相当。而相应时期内，初中学历的同类婚现象基本保持稳定（见图 2c）。这些变化趋势表明，过去半个多世纪内，随着大众教育、尤其是九年义务教育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接受中、高等教育；年轻一代中未接受过高中教育者在个人能力、文化资源、经济潜力等方面的劣势变得更为突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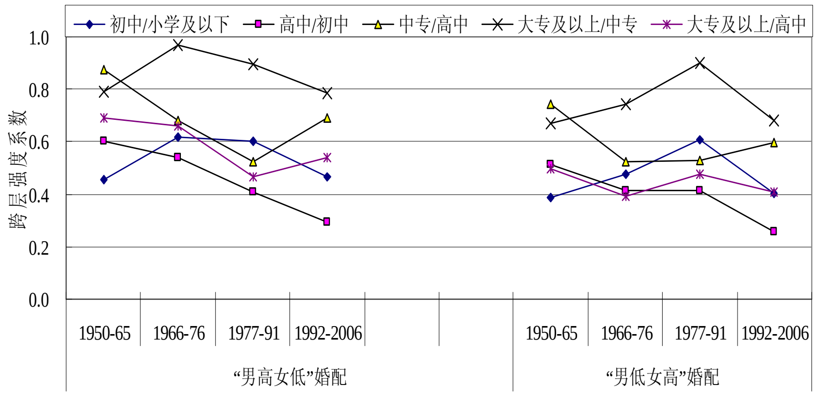


图 3　各时期相邻教育程度的男女婚配强度系数的变化趋势

2. 户口类型的异质性婚配现象及其变化趋势

图 4 展示了相邻户口类型的男女之间异质婚的具体特征和变化趋势。由图 4 中左右两组曲线可见，在户口类型的婚配关系中，“男高女低”的选择相对更为普遍，女性向上婚的婚配模式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对比左右两组曲线，在各相邻户口类型的婚配关系中，男高女低的婚配模式均高出相应男低女高的选择；这一点在农业户口与镇县级非农业户口、镇县级非农业户口与地级市非农业户口的异质性婚配关系中尤为突出。各时期异质性婚配强度的具体变化进一步表明，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女性向上婚现象随时间不断增强，这可能与相应时期婚姻在女性实现向上社会流动中的重要性有关（Xu et al.，2000 等）。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女性教育的快速发展，不同户口类型的异质性婚配中女性向上婚的现象开始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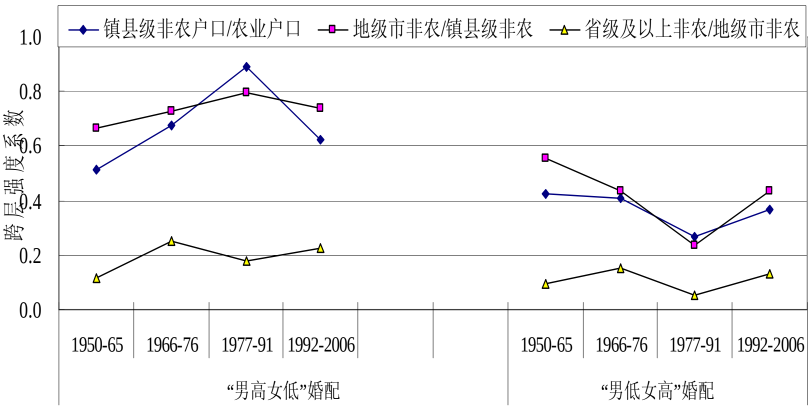


图 4　各时期相邻户口类型的男女婚配强度系数的变化趋势

在考察时期内，户口类型的异质性婚配现象更多地发生在户口梯度的底端，也即地级市非农业户口及以下。在相邻户口类型的异质性婚配中，省城及以上非农业户口与地级市非农业户口之间通婚的可能性最低。这表明省城及以上非农业户口在资源、利益等方面的突出优势和排他性，其开放性较差。这也与图 2b 中不同户口类型的同类婚强度差异相吻合，户口类型越高，其可渗透性越差，同类婚现象越强。

在考察时期的各阶段，相邻户口类型的男女之间结婚可能性的相对强度及其变化趋势仍存在一定的规律。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不论是“男高女低”或“男低女高”的婚配选择，地级市非农业户口与镇县级非农业户口者结婚的可能性最大，其次为镇县级非农业户口与农业户口之间的婚配现象；这一特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仍存在。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之间的可渗透性有所增强，镇县级非农业户口与农业户口之间通婚的可能性开始超过地级市非农业户口与镇县级非农业户口的通婚现象。然而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以及快速城市化进程（包括一系列地市合并、市管县措施的实施）使镇县级与地级市非农业户口之间的差距相对缩小，二者之间通婚的可能性重新成为不同户口类型的异质性婚配中最常见的选择。

六、小结与讨论

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同类婚在我国婚姻匹配现象中占据主导地

位。也即，多数婚龄青年选择与自己（个人或家庭）社会经济特征相当的异性结婚。这种同类婚（或称内婚）现象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在世界多数国家的婚配模式中占据重要地位。值得一提的是，受男女不同特征分布的结构性差异、婚姻文化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婚配选择特征多元性的影响，异质性婚配现象在各时期均客观存在。对称性婚配是我国异质性婚配现象的重要特征。除户口类型的匹配关系外，本文考察的初婚同期群中女性向上婚现象均不明显。这一发现与许小禾等（Xu et al.，2000）的研究结果相吻合。

本文的研究结论部分印证了工业化理论对解释我国婚姻匹配模式变迁的适用性。20 世纪 50 年代到 90 年代初，我国婚姻匹配模式中以父亲职业为代表的家庭背景的匹配程度稳步下降，以个人教育程度、职业等为标志的自致性因素的匹配程度快速上升。这一时期不同因素在婚配选择中重要性的演变为工业化理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揭示了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社会职业结构的变革、教育大众化、人口流动与城市化趋势、以及现代交通和通迅技术发展在婚姻家庭领域产生的深刻影响。然而，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以父亲职业为代表的家庭背景在婚姻匹配中的重要性出现回升；与此同时，个人自致性因素在婚姻匹配中的重要性持续上升。这一演变特征仅部分与工业化理论相吻合，即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自致性因素在婚姻匹配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这一时期先赋性特征在婚姻匹配中重要性的回升可能与深化市场化改革所导致的急剧社会转型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社会生活和行为的不确定性上升有关。

与西方国家的工业化经历不同，我国的工业化历程伴随着社会体制从计划到市场的剧烈变革。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发展，国有企业深化改革，计划经济时期发展起来的资源分配关系被彻底打破；在教育领域，高等教育扩招与收费制度的改革，使得高等教育内部的分层现象凸显，家庭经济资源对个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质量以及专业选择影响上升；在就业领域，计划经济时期发展起来的中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就业分配制度被打破，个人的就业选择与教育之间的关系受到市场供求等一系列外部因素的影响，大学生就业难现象也历史性地浮出水面。这些社会转型与制度变革使得社会经济生活中不确定性上升，并深刻地影响着婚龄青年的婚配选择。受中国传统家庭文化观念的影响，在社会生活中不确定性上升时，家庭背景的差异重新融入、并渗透到个人社会生活中，也因此在婚姻匹配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正是这种转型社会的特殊性，导致了我国婚配模式对工业化理论的偏离。

各时期特定婚配特征同类婚强度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特征不同梯度的相对排他性，而相应的异质性婚配关系变化则进一步揭示了不同梯度之间的相对距离与可渗透性。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以初中-高中为界，在教育梯度的上端，异质性婚配现象更易发生；在教育梯度的中下端，初中及以下学历者与高中学历者之间通婚的可能性相对较小、且随时间呈快速下降趋势。值得一提的是，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教育体系不同，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在教育梯度中的地位较为特殊，且随高等教育扩张经历了重要的演变过程。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受教育发展状况与就业分配制度的影响，中专与大专学历的社会距离相对较小。然而，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高等教育扩张和就业制度的改革，中专与高等教育的社会距离开始迅速扩大，相应地，中专与高中学历的相对地位更为接近。概括而言，各时期不同学历群体在社会资源、经济潜力等方面差异的大小决定了它们之间的相对距离和异质性婚配可能性的大小。在义务教育基本普及、高等教育不断扩张的情况下，教育梯度的社会边界突出地表现在高等教育和其他教育之间，一方面，高等教育的社会边界不断增强，其同类婚趋势不断上升；与此同时，未接受过后义务阶段教育的个体在婚姻选择和其他方面的劣势不断凸显。

此外，户口类型的婚配关系表明，以户口所属地的行政级别与户口性质来划分，户口类型越高，同类婚强度越强，异质性婚配的可能性越小。特别地，各时期省城及以上非农业户口在婚配选择中的相对开放性最小。不同户口类型的相对开放性以及户口异质性婚配中显著的女性向上婚现象表明，农业户口男性在婚配选择中面临着更大的劣势、更有可能在婚姻市场上成为被挤压的对象。因此，改革户籍制度，特别是逐步降低大城市的户籍壁垒，对于扩大婚姻选择的范围、促进不同户口类型在婚姻市场上的流动性和可渗透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强化了以自致性特征为主的婚姻匹配关系，而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发展，先赋性特征在婚姻匹配中的重要性也出现回升。这些变化趋势无疑会对社会资源的集聚和不平等程度、社会阶层的生产与再生产产生重要的影响。如何改善婚姻市场中各社会阶层的可渗透性、增强婚配选择的开放性、促进社会资源合理流动和均衡化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迈向更加公平、开放与和谐的社会所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李路路、王宇，2009，《当代中国中间阶层的社会存在：社会生活状况》，《江苏社会科学》第 1 期。

李煜，2008，《婚姻的教育匹配：50 年来的变迁》，《中国人口科学》第 3 期。

——，2011，《婚姻匹配的变迁：社会开放性的视角》，《社会学研究》第 3 期：122-136.

李煜、陆新超，2008，《择偶配对的同质性与变迁——自致性与先赋性的匹配》，《青年研究》第 6 期。

孙秀艳，2002，《青年择偶标准的历史演变和现实思考》，《社会》第 4 期。

吴雪莹、陈如，1997，《当代人择偶重什么？》，《妇女研究论丛》第 1 期。

徐安琪，2000，《择偶标准：五十年变迁及其原因分析》，《社会学研究》第 6 期。

张翼，2003，《中国阶层内婚制的延续》，《中国人口科学》第 4 期。

张翼，2010，《家庭背景影响了人们教育和社会阶层地位的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 4 期。

Beck, Ulrich 1992,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Blau, P. M. & O. D Duncan 1967,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w York: Wiley Free Press.

Clogg, C. C. & E. S. Shihadeh 1994, *Statistical Models for Ordinal Data*.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Giddens, Anthony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Stand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Goodman，Leo A. 1979, "Simple Models for the Analysis of Association in Cross-classifications Having Ordered Categori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74.

Goodman, Leo A. & Michael Hout 1998, "Statistical Methods and Graphical Displays for Analyzing How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wo Qualitative Variables Differs among Countries, among Groups, or over Time: A Modified Regression-Type Approach." In Adrian E. Raftery, (ed.)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Washington, DC: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175-230.

Han, Hongyun 2010, "Trends in Educational Assortative Marriage in China from 1970 to 2000." *Demographic Research* 22(24).

Kalmijn, Matthijs 1994, "Assortative Mating by Cultural and Economic Occupational Statu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0(2).

Kalmijn, Matthijs 1998, "Intermarriage and Homogamy: Causes, Patterns, Trend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4.

Kerr, C., J. T. Dunlop, F. H. Harbison & C. A. Myers 1960, *Industr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 The Problems of Labor and Management in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are, Robert. 1981, "Change and Stability in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6(1).

Mare, Robert D. 1991, "Five Decades of Educational Assortative Mating."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6(1).

Powers, Daniel A. & Yu Xie 2000, *Statistical Methods for Categorical Data Analysis.*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Schwartz, Christine R. & Robert D. Mare 2005, "Trends in Educational Assortative Marriage from 1940 to 2003." *Demography* 42(4).

Smits, J., W. Ultee & J. Lammers 1998, "Educational Homogamy in 65 countries: An Explanation of Differences in Openness Using Country-level Explanatory Variabl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3(2).

Treiman, D. J. 1970. "Industrialization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E. O. Laumann (ed.), *Social Stratific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for the 1970s*.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Xie, Yu 1992, "The Log-multiplicative Layer Effect Model for Comparing Mobility Tabl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7.

Xu, Xiaohe, Jianjun Ji & Yuk-Ying Tung 2000, "Social and Political Assortative Mating in Urban China."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1.

Zijdeman, Richard L. & Ineke Maas 2010, "Assortative Mating by Occupational Status during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28.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齐亚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牛建林）

责任编辑：杨　可

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2012 年第 1 期